

赵景深·胡忌先生往来书信

黄绮静
解玉峰
编

赵景深·胡忌先生往来书信

黄绮静



本册编号：109

编 者：黄绮静 解玉峰

整 理：赵易林 徐重庆

章子林 徐 湖

印 数：1-150 册

日 期：2013 年 9 月

设计印刷：湖州轩骏图文

过往的醇读之味

——读《赵景深·胡忌先生往来书信》志感

1998 年秋，我因业师俞为民先生引介，去胡忌先生府上请益。先生待后学极为恳诚，令人心感。自是之后，我即常往府上问学，一般一两周一次，直至 2004 年先生辞世。平时除向胡忌先生请教一些学术问题外，也常听先生闲谈一些学坛、戏界掌故、趣闻，谈得最多的是赵景深、任二北（半塘）、钱南扬、唐圭璋等前辈。每及佳境，谈者忘倦，听者神往。

大概是 2002 年春某日，先生出示我赵景深先生过去二三十年间写给他的信件：我一见大为惊讶——那数百通信件皆以细线包扎、一捆捆丝毫不乱，信封邮票完整无缺！那也是我第一次目睹赵景深先生的笔迹。

据黄绮静师母后来说，赵景深先生与胡忌先生的往复信件最早者始自 1948 年，这些信件文革结束后复旦专案组全数退还给赵景深先生。赵景深先生去世后，赵景深先生哲嗣赵易林先生 1985 年底将他们这些往复信件全部寄给胡忌先生。胡忌先生曾重新包扎，装在《戏文》编辑部所用大信封，信封题：“归功于文革，代我保存，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胡

忌记事 1996 夏。”

胡忌先生有意将这些信件陆续加以整理，于是我和当时正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张进（现任中华书局编辑）以及另外一位朋友整理了其中部分信件，有些信件打印出来重交胡忌先生订正，这就是本书信集中赵景深先生六十年代（1961年3月5日至1966年3月7日）和八十年代（1980年3月21日至1984年10月3日）致胡忌先生的信件68通。^①

现在想来，胡忌先生精神已大减于一两年前，但当时还以为来日方长，以后慢慢整理不迟。谁料不到两年，先生遽归道山。赵景深先生给胡忌先生全部信件以及胡忌先生给赵景深先生的绝大多数信件遂连同胡忌先生万余册藏书一起捐献给浙江遂昌汤显祖纪念馆。

收在本书信集的书信除赵景深先生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致胡忌先生的信件68通外，还有胡忌先生七十年代后期致赵景深先生的信件27通^②，这27通信件乃赵易林先生寄给赵景深先生弟子徐重庆先生保存的信件（这些信件遂昌汤显祖纪念馆未有副本）。徐重庆先生古道热肠，希望将这些信件及胡忌先生诗词加以整理，自印百册以赠同好，以追念

^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部分信件并非完整连贯的。此外，笔者目前尚有赵景深先生1973年至1976年间写给胡忌先生的十几封信的电子版，因这些信错误极多，现在也无法重新核定、复印，笔者深感惭愧！只能期望将来能补此遗憾。

前辈，遂有这部书信集的印行。

今年寒假期间，阅读这些信件，看到我曾非常熟悉的胡忌先生的手迹，先生旧时音容笑貌不时浮现眼前。在这样的心境下，读他与赵景深先生往来书信更使我感触颇多。

这些书信所涉及的都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人和事。最近的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速公路、高铁、手机、网络、雾霾天、地沟油……整个社会正越来越快地加速运转，我们几乎不敢想象三四十年的景象。

我本人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九六九年出生的，对整个七十年代乃至后来的八十年代并没有多少清楚的记忆。最近这几年，偶或自网络或书刊看到八十年代或更早些时期的影像、照片时，一方面是觉得似曾相识，同时也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故所以今日阅读这些书信时，对过去的六七十年代似乎有了更多真切的认识。

最近二十年，“忙乱”二字似乎可用以形容我们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但自赵景深、胡忌两位先生的往来书信中，我则读到了一个平静、有序的年代。现在我手边的书信集主要是赵景深先生写给胡忌先生的信件 68 通，时间段分别为 1961 年 3 月 5 日至 1966 年 3 月 7 日（27 通）以及 1980 年 3 月 21 日至 1984 年 10 月 3 日（41 通）；胡忌先生写给赵景

深先生的信 27 通，自 1977 年 2 月 25 日至 1978 年 7 月 31 日。自信件写作时间看，前后相继两通信的时间间隔大多为十天或半月，有时连续几月或一两年如此，很少例外，故 1977 年 5 月 23 日胡忌先生写给赵先生的信中说：“忽忽已过二十日，这么长时间没有去信问候，罪该万死。”考虑到当时一般信件的邮递速度，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大多是接到对方信件几日后便回信的。自信件篇幅来看，大多数信件字数都在五六百字，赵景深先生写给胡忌先生的信字数显得更有“规律”，胡忌先生写给赵景深先生的信中七八百字以上者也有很多。这也就是说，他们的通信都是有实际内容的，绝非敷衍、虚应其事。以上我主要从“表面现象”——信件时间间隔、篇幅字数，去说明过去生活的平静、有序。当然，当时人们“平静、有序”的生活心态，在这近百通信件中自有更明显的反映。这一点如果各位静心一读，自有体味，似不必费言了。

读这些信件，我另一感受是其中蕴含的默默的人世“温情”。赵景深先生与胡忌先生属于师徒关系，但其师生情谊显然非同一般。胡忌先生 1953 年由父执介绍入赵景深先生门下读书治学，此为其师徒关系之始。自两人的往复信件来看，师徒二人关系更多中国传统社会的色彩，不同于五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一般学校中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赵

景深先生对胡忌先生殷切的关心、勉励和教诲时时可见。胡忌先生六七十年代长期在东北工作，希望能调到上海工作，一时工作不能安心。故赵景深先生 1963 年 6 月 30 日给胡忌先生信中说：

你父亲也来看了我，还给我写了信。老人家爱小辈的心理，我是能够了解的。他巴望你在他身边，也希望你的婚事能够解决。他说，我说的话，你比较要听。他的意思是：“工作诚不容易调动，只好耐心等待，再想办法，不可任意急躁而行。”我也同意他的看法，特别是不能自由散漫，仍旧要将工作做好。不论是否离开沈阳，都首先要将工作做好。你认为你工作做得不好，或无心工作而将工作做坏，他们觉得你无用处，徒耗粮食会放你走，这看法是错误的。在任何条件下，必须将工作做好，这是作为一个参加社会建设的工作者必须认识到的。安波准了，当然很好；他不准，当然不能急躁得形之于面色，或言语顶撞。

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劝勉，如 1964 年 9 月 7 日信中说：

大作《昆曲简史》的确在思想性和现代戏两方面要加强了。古典剧不能肯定过多，一方面可以肯定在古代当时的进步意义，一方面也要谈到它在今天的副作用或意义的消失。

赵景深先生对胡忌先生如此，胡忌先生对赵先生也自然非常敬爱。如 1983 年 4 月，赵景深先生因眼疾，不能看小

字，胡忌先生乃用毛笔写信，赵先生 1983 年 4 月 19 日的回信中说“很感动”。

当然，我所谓的“温情”，实并不限于他们二位之间。如 1981 年赵景深先生为争取更多名额让上海曲社的曲友参加昆剧传习所六十周年活动、关心谭正壁先生的生活状况、任中敏先生在南京的手术等，均可见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友善。

说那个时代多有人情味，并非是说当下全是冷漠、无情，今日人与人之间仍有真情在，只不过因为“忙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业”，求人间温情，似属奢侈之物了。

读赵景深先生、胡忌先生这些往复信件，我又一感受是当时人们对生活的那种“热情”、“激情”。胡忌先生写给赵先生的信中多次非常热情地谈到其撰写《唱赚史》、《昆曲史》等论著的学术抱负，也经常与赵先生交流交流当时学界的情况，如 1978 年 1 月 24 日的信中说：

在南京经常和吴新雷（南京大学教授）兄见面。他新近很努力，写了一些关于昆曲推陈出新的文章，……钱南扬先生和唐老圭璋处也去了。老专家仍孜孜不倦地致力词曲研究，钱是《永乐大典》三种戏文，唐是《全宋词》，精神颇佳，值得后辈好好学习。

又如同年 6 月 30 日信中说：

二北先生这回到京专心致志于敦煌词研究。他告诉我尽量少出去应酬，把有生之年付与敦煌词。老先生的精神可钦敬！……近来事情不多。我对《文物考古与戏曲史》的编纂兴致勃发。

胡忌先生说这番话时已四十六七岁了，现在我读到时不免反躬自问：现在的我年龄上与他那时基本相仿，但我有他那时的“热情”、“激情”么？

这些往复信件最末的写于 1984 年 10 月。1984 年以前我尚为懵懂无知的少年，1990 年前后也许可算青春岁月，所以就我本人而言，九十年代以来似乎是“热情”、“激情”逐渐消退，直至今日。这种消退，一方面也许是因自己心智逐渐成熟、理性，但另一方面则似乎是社会环境使然——我仍然记得八十年代《在希望的田野上》、《血染的风采》等歌曲曾风行一时，而今这种类型的歌曲再也听不到了。我能接触的周围的人们也大都忙碌着，很少听到有人谈“梦想”、“理想”或长远的人生规划，眼前之事已使许多人终日忙碌、焦虑，稍有精力又为眼前海量的新闻、影像或书刊所吸引……我们往往不自觉地身外巨大的外力所推动，如处洪流，身不由己，来不及思考或选择自己的方向，身心疲惫、麻木不仁……

说出上面一些话，似乎更多是批评当下，而赞美过往，

这当然也并非我的初衷。因为过去已成过去，我们已无法回到从前，今天也没有几位中国人愿意真正回到从前。我们今日沉思过往，也许更多是珍惜过往许多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在将来也许仍然值得珍视。我们生活的当下，也应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待将来反观时我们才会发现和珍视。如此在历史的不断延续中，我们虽有迫不得已的不断的舍弃，但在不断的反视中也能不断积累许多美好的东西。

最近几日，我也不断努力体会胡忌先生“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几个字。胡忌先生所谓的“历史”价值应当不限于我以上几点粗浅的感受。他们二位的往复信件前后长达二十馀年，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自可从不同角度获取不同的可贵“历史史料”。如近就学术界或艺术界而言，他们的信件中谈及许多文人、学者，如任二北（半塘）、钱南扬、唐圭璋、夏承焘、谭其骧、俞平伯、路工、谭正璧、吴白匋、葛一虹、俞振飞、马彦祥、张允和以及昆剧传字辈演员周传瑛等，其中对当时的戏曲界、特别是昆剧界的各类活动多有反应和记载，诚属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这一方面，读者自有选择、判断，我可以不必费言了。

后学 解玉峰 谨志

2013年3月11日夜

目 录

过往的醇读之味

——读《赵景深·胡忌先生往来书信》志感

..... 解玉峰 1~8

赵景深致胡忌信（27 通） 1~32

1961 年 3 月 5 日~1966 年 3 月 31 日

赵景深最后期信（41 通） 33~86

1980 年 3 月 21 日~1984 年 10 月 3 日

胡忌致赵景深信（27 通） 87~163

1977 年 2 月 25 日~11 月 16 日

1978 年 1 月 24 日~7 月 31 日

赵景深致胡忌信

1、1961年3月5日

胡忌先生：

正想念着你，就接到来信，快慰何如！谢谢你告诉我《考古》（八月号）上徐苹芳的大作，我已于昨日找来看过了。据此，可证宋墓中的雕砖确为杂剧雕砖，因为造型大致相似，却是在舞厅中演出的。你意以为如何？该不会是一般故事画或风俗画吧？

来信是二月廿一日收到的，直到十二天后才发信，这是由于这些天比较忙，一直开会，辞海会议在锦江开了三个上下午，加上浦江饭店（外白渡桥堍，即前礼查饭店）开了一个下午，加上校务会议、百家争鸣讨论会以及两个上下午的高教会议，非常忙碌。更忙的是，这次上的是新课，备课很花时间，课程名为《古代戏曲研究》，要讲四个专题：1. 古代戏曲理论简述；2. 明代的民间戏曲；3. 古代戏曲的艺术特征；4. 怎样研究古代戏曲。

你的具体工作已经决定了么？研究什么专题呢？

《南词叙录》据《今乐考证》补了几个“□”的字，甚好。但有两句标点并注错了。原文该是：“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种妙处。”集成第三册面243行十一却点成：“文既不可俗，又不可[不]自有一种妙处。”注中妄加一个“不”字，实在是多余的。P246第三行末二字“此剧……”

应另起一行，因为这以下不仅讲到“末”，还讲到“外、净、旦”，不能都作“末”的解释。同面第八行，既云“白为宾”，当然“故曰宾白”，应将“宾白”作为一个词，不应将“宾、白”作为两个词用顿号来点断，应从徐渭自己的意思，仅管“宾白”二字也可以作为两个词来解释。

敬礼

赵景深

2、1961年3月19日

仲平弟^(注)：

你离家更远了，收到家里和师友们的来信，自然是分外感到亲切的。我呢？特别喜欢与戏曲研究者通信，自然也就喜欢能看到你的信。你现在虽然搞话剧，究竟也还是戏剧，与戏曲是相通的。晚间有精力，还是可以摸摸自己的老行当，例如编写《古代戏曲选注》第三册。

开课期间，十二天开了八次会。这两个星期十四天只开了四次会，但戏却看得很多，徽剧看了四次，茂腔看了两次。今天下午要补看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明天上午看甬剧《半把剪刀》，下午看京剧《绿原红旗》（青海省京剧团演出）；

注：胡忌，字仲平。——编者

后天还要看青岛话剧团以城市人民公社为题材的《三八红旗手》。很累，还是想看；功课备得不充分，奈何奈何！我心里在斗争。

我倒不怕我所教的第一题，因为已有同学们所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做底子。我怕的是第三题：中国古典戏曲的艺术特征，这课题我从未思索过，也没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材料。

《上海戏剧》上有顾仲彝一文。《戏剧研究》上欧阳予倩也许写有文章吧？

《南词叙录》谈角色时，谈完南曲（分段），就另行谈北曲（只作一段）：即以北曲为附录，与上面所述南曲对照。你翻检小本《曲苑》（影印本）就可以知道了。《增补曲苑》大约谈北曲时也是另外起行的。

你谈到朱凤森的《崑山六种曲》，的确是比较少见的。我有时也买到一些清代的戏曲。

敬礼

赵景深

3、1961年4月7日

仲平同志：

来信收到。我从张次溪（《梨园史料》辑者）那儿曾得